

書評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By David D. Buck. (Madison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xvi + 290 pp. Bibliography, Character List, Index.)

都市化的出現，顯示出一個國家已進入現代化的階段，前者可說是後者的特徵之一。學者對於西方社會都市化與現代化的研究，成績斐然。可是，有關討論中國都市化的著作，無論在質或量方面，與專論西方社會的比較，便顯得瞠乎其後。西方學人中，現執教密執安(Michigan)大學的Rhoads Murphey教授，可說是研究近代中國都市化的前驅。他在1953年出版的*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一書，實為西方學人研究中國近代都市化較具深度和見解的著作，替日後鑽研此課題的學者啓迪了新的路向。自此，西方學術界對中國都市的研究，益加重視。如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學Gilbert Rozman博士在1973年出版的*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史丹福大學先後在1971、1974及1977年，分別由John Wilson Lewis、Mark Elvin及William G. Skinner編集了*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及*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三書，即為其中的表表者。威斯康辛大學卜大維教授為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都市化的後起之秀，對濟南都市化鑽研有年；其在史丹福大學的博士論文，即以清末至民國時期濟南現代化為題。最近，復將其論文修訂成書出版；本書的面世，對中國都市現代化的研究，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全書共分九章，以年為經，以事為緯，將濟南從清末至國民政府治下的發展情況，逐一分析說明。在首章中，作者說明選取濟南為研究對象，主要繫於下列因素：從1890—1949六十年中，在大部分時間內，該地的政治權力，掌握於中國人手中，而現代化計劃都由中國人草擬與推行。又早在本世紀前，濟南已是主要的行政都市，確具政治及經濟中心的特色，雖與外力稍有接觸，卻不受外力支配。在這種情況下，工業、商業、政治、社會發展得以迅速展開，與十九世紀西方都市化的模式類似。(頁12)

作者認為濟南在邁向西方模式的都市化過程中，明顯地可分為六個時期，即：十九世紀末葉，1900年以後清廷改革的十年、民國最初之五年、1916—27年軍閥統治下的不愉快時期、南京政府時代的十年、最後，則為貫串於1938—48年間的大戰及內戰期。本書的第二至九章，即按上述分期描劃出從清末至國民政府治下濟南的

各種變遷。

在首章中，作者即開宗明義的指出濟南現代化的成敗關鍵，繫於三項決定性因素：外力影響、政治領袖及一般經濟變化模式。（頁12）貫串全書的主題，於是這三項因素的交互作用對濟南邁向現代化過程的貢獻成障礙。

據作者研究所得的結論，1949年以前，濟南都市發展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雖已作出重要的開端，但經濟、政治現代化的水平，與西方都市仍有很大距離，而前二者為都市全面現代化的必須條件。在文化、技藝領域方面，吸取西方習尚的結果，使濟南與堅持傳統方式的農村腹地決裂。

經濟現代化方面，濟南產業工人的人數，在就業工人總數內，無論絕對數目及百分比，所佔的分量都很低微。明顯的，工業仍從屬於商業。這點顯示了濟南未臻西方都市現代化的模式。濟南經濟現代化失敗最重要的因素，在於軍閥的影響。1900—1916年，在袁世凱勢力支配的時期，政府支持的計劃有助於濟南開展工業化。1916年以後，軍閥的苛征暴斂及自相火併，對濟南工、商業現代化的努力造成很大的損害。軍閥統治的影響既如此惡劣，可以說，早在1925年，濟南經濟現代化的希望已完全幻滅。

政治現代化方面，從1890—1949年整段期間，濟南並沒有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袁世凱、韓復榘等軍事領袖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賴於技巧的運用傳統的管理方式、人事關係及社會習尚。從濟南的經驗可體會到軍閥統治，不論是破壞性的，或是溫和進步的，都不能保護人民，免受不法的壓榨。這段時期統治濟南的軍閥政權，對省政管理方面，並未能建立一專業而現代化的官僚組織，使濟南與農村腹地分隔的情況益趨嚴重。

文化現代化方面，雖然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到濟南訪問、參觀的人都認為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及風尚仍根深蒂固，在文化領域的變遷，無可懷疑要比其他各方面為深刻。變化最大的莫過於教育。採用西方課程，富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公立學校紛紛出現，教員的教育觀都是專業及現代化的。外來文化滲入濟南生活的其他領域，娛樂、服式、建築物設計等莫不受其影響。反之，在農村，這些技術革新卻甚少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文化變遷使濟南市民與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的現實生活距離得很遠。沒有經濟、政治的發展，文化的現代化帶來的不是歡樂，而是不幸，因為它使取得現代文化的人失去對傳統文化的控制，從而不能提供一足以使中國蛻變的堅強的政治及經濟基礎。

書後附有三附錄，附錄A對濟南1900—1936年的工業作簡明的介紹。附錄B詳細說明了1770—1975年濟南人口的變動情況，作者精密的運用中、日以至西方的各種有關材料，配合統計學的方法，小心的推算這二百年濟南人口的消長，並與山東全省人口率的增長有所比較。在三附錄中最饒價值。附錄C列出了1911年十一月山

東諮議局的要求。

本書取材豐富，從縣志、外交檔案、報章、雜誌、調查報告、近代學人研究成果，以至小說都加以參考運用。爲了搜羅有關史料，作者先後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藏書部、華盛頓國家檔案庫(National Archives)、紐約教會研究圖書館(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東洋文庫及倫敦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進行研究。尤爲難得者，作者於1974年11月親自實地到濟南訪問觀察，書中所論，當屬信而有徵。所附有關濟南或山東地圖、照片，或採自富有價值的史料，甚至來自美國國防部的空中投影，或據有關文籍圖片描繪出來，彌足珍貴。由於有關史料浩如煙海，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最明顯的，莫過於作者沒有採用張玉法先生對山東近代化的研究成果。張氏在本書出版前發表的有關論著，計有：「清末民初的山東自治」，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期(台北，民國66年)；「清末民初山東的工業發展」，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歷史研究所合編《歷史學報》第四期(民國65年)；「清末山東的教育改革」，載前引刊物第五期(民國66年)，與本書討論範圍關係密切，可惜作者未能及時參考徵用。袁世凱是清末推動東省改革的重要負責人，本書僅徵引《養壽園奏議輯要》，卻忽視了史料價值較前書爲高的《袁世凱奏摺專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故宮文獻》第一集，民國54年)，實在美中不足。軍閥統治是濟南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對軍閥問題作全面綜合探討的著作，並不多觀。1976年史丹福大學出版Hsi-sheng Chi(齊錫生)所著之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9—1928* 一書，當爲此中翹楚。作者如能注意此書，當對軍閥統治山東的影響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海關十年報告》對通商口岸諸省的報導，大致翔實可靠，本書並沒有採用。將來本書在再版時，作者如能將上開各書、文列入參考，自更錦上添花。

本書標題雖以濟南爲研究重點，斷限以1949年止，但就內容來說，要比標題所示廣泛。可以這樣說，作者研究濟南，是以遼濶的山東腹地作背景，透過清末至國民政府治下的濟南，與1949年以後的濟南新貌作一比較，求出中國都市現代化的意義。其中討論中國都市邁向現代化過程中，與廣大農村的差異愈大，分歧、對立愈益明顯，引致現代化的努力完全失敗，所見饒具深意。對外力影響、政治領袖及一般經濟變化模式這三項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本書常以比較的方法，說明三者在濟南邁向現代化途中所起的作用。外力影響方面，作者對於德、日在山東經營的成敗，日本在山東與東北侵畧活動的異同，青島、瀋陽等受外力影響較大的城市，與濟南的分別何在？都有精到的分析。政治領袖方面，本書對先後主持東省政局的首腦，如袁世凱、張宗昌、韓復榘等統治措施與濟南現代化的關係，闡釋尤爲詳盡。此外，東省領導人物與中央及地方士紳之間的關係對濟南都市現代化的影響，買

辦、官僚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在濟南現代化中的作用，本書也有清楚、深刻的交代。至於一般經濟變化怎樣刺激濟南邁向現代化之途，本書所論也不乏精到之見。最有意義的，莫過於作者拿1949年以後濟南發展的新貌，如從「消費」轉變為「生產」都市，消弭城、鄉對立等，與1949年以前的詳加比較，藉此將今後中國都市現代化應採的路向詳細提示。就以上各點來說，本書所載，未嘗不可說是山東趨向現代化過程的縮影。

有關「官僚資本」的作用，作者不像一般馬、列主義史學家一樣，認為「官僚資本」要對濟南經濟破產負責。這些教條主義的史學家，一致認為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官員將國家資本，包括奪自戰敗國日本的敵產賣給自己的家人，或相熟的江浙財閥份子以自肥。可是，就1945年以後，濟南經濟從未恢復到足以使任何一方的利益集團，以國家資本營謀一己私利的事實來看，前述說法的普遍有效性，實為一疑問。反之，從1916至本世紀三十年代這段時期，官僚資本在促進濟南的工業投資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頁14）對於馬若孟(Ramon Myers)教授研究華北農村生活水準及城鄉關係的論點，作者也有所補充及修正。（頁200—201、208）

本書所述，範圍既不全限濟南一隅，斷限也不全止於1949年，因此，可資商榷的論點，自然不可避免。在頁29中，作者認為清廷鎮壓捻軍活動後，一般來說，李鴻章支配了山東巡撫的任命權，他經常安插效忠於他，而對東省事務富有經驗的人，出任該省巡撫一職。這種說法，明顯的是受到區域分權主義(Regionalism)學派的影響。劉廣京教授曾就此問題作過精闢的分析。他指出在咸、同以後，清廷仍能有效控制督撫，主要在於「朝廷對督撫之任免有絕對之權柄。」「除利用文化及倫理為維繫外，同時更儘量利用朝廷之絕對威權，繼續執行傳統控馭各省政策最重要之一項：即除極少數之例外，督撫之人事時予以更動，使其在一省之任期不致於過長。」（見「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二輯，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6年，頁853、858）以1875—1900年山東巡撫的任期為例，任期在一至三年的有七人，三至六年的三人，任期在此以上的絕無僅有。（前引文，頁862）即使李鴻章轄下的直隸省，「除淮軍不計外，所有自強事業自機器局以至於北洋海軍，若非中央支持，決無法創辦與維持。」（前引文，頁874）作者所論，顯然與事實大有出入。

排印方面，本書也有好些因音譯或中文書寫致誤的地方，其中以徵引書目及中英字彙對照表較多。頁19、286，Lo-yuan（濼源）及頁23、286，Lo-K'ou（濼口）分別誤作Le-yuan及Le-K'ou；頁31、154、287把Li-chin（利津）誤譯作Li-ching；頁54、284，Chi-nan---tien-tung kung-ssu（濟南……電燈公司），tien-tung應更正為tien-teng；頁64、287，Lin-sheng（廩生）誤譯為Ling-sheng；頁75、284，Chia Ping-ch'ing（賈賓卿）應作Chia Pin-ch'ing；頁119、120、290之Wang Le-p'ing

(王樂平)應改正作Wang Lo-p'ing; Wang Hsiang-ch'ien (王湘岑)應作Wang Hsiang-ch'en。

注釋部份：頁240，註8“Pan hsiang-ch'eng”，應改作“Pien hsiang-ch'eng”(「辨鄉城」)。

書目部份：頁265《膠澳志》誤書為《膠奧志》；頁269《近代中國史事日記》「日記」實為「日誌」之誤；仁井田陞，應更正為仁井田陸；頁272，丁惟汾誤作丁惟芬；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集1895—1914，漏去「資料」兩字，1914則誤書作1954；《秦德純回憶錄》誤作《回意錄》；頁275，《新社論》應更正作《新事論》；頁277，顧敦柔誤書為辜敦柔；“San-kuo kan-she--ho-shan... chien-i-shu,” ho-shan (洽商)應改作ho-shang；頁279，《山東問題史末》，「史末」應作「始末」，《山東鐵道與礦山》，鐵誤書作鐵。

中、英文字彙對照表方面：頁285，辛莊誤作幸莊；頁287，跑突泉應更正作鈞突泉；頁290，銅瓦廂誤作銅瓦鄉，吳化文誤為吳華文，楊士琦誤書作楊士騎。

作者廣羅學術界、政治界對中國近代都市化的意見，以堅實的材料為根據，結合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衡量各家學說的有效程度，並提出自己的見解，絕不為一曲之見所囿。對於有興趣從事中國近代歷史、地理、社會、政治以至經濟的學人，本書是一本值得推薦一讀的著作。在中、外學術界的合作下，中國都市現代化的研究水平，肯定會比現階段大大提高。中國學人亦會急起直追，將中、西方都市研究水平的距離縮短；在這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區域研究計劃，實在是個良好的開端。

錢鍾書：《管錐編》(一至四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年，1558頁)。

才子錢鍾書(字默存)以《莊子·秋水》中「用管闕(窺)天，用錐指地」這妙喻，將其新著稱為《管錐編》，謙虛暗示「求之以察，索之以辯……不亦小乎！」古語「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不說錐指而說蠡測。蠡本作竄，俗作螺。用螺殼載海水億萬次，也不能測量汪洋的深度。此亦為高級謙辭。錢著涉及古今中外大量典籍，氣魄規模遠勝舊作《談藝錄》，訓詁、歷史和哲學等方面都豐富得多。序云：「命筆之時，數請益於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按《禮記·學記》「善待問